

单书健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老中医经验

整理方法的探讨

(京)新登字027号

责任编辑:傅景华

封面设计:石洋

老中医经验整理方法的探讨

单书健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京00700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44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中国中医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开本 6.125 印张 137 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0013—523—3 R·520

定价:5.80元

序

单君书健，余之挚友也。致力于老中医经验之整理研究十余载矣，孜孜不倦。八五年主编《吉林省名老中医经验选编》梓行，八七年设计筹划并做为主要编者之《当代中国针灸临证精要》出版，均为医林所重。八六年筹划设计并主持编纂《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丛书，以常见病为纲，汇集国内名宿之独到经验，岁历六稔，终于告竣。煌煌廿四辑，灿然大观。在老中医经验书中，是书规模最巨，挖掘最深，成就最著，堪称壮举，并荣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求购信函，纷沓而至，评价甚高；偶然购得一二辑，拯垂危起沉疴，应手而效，屡验不爽，堪称宝书。面世即罄，一时洛阳纸贵。国内名宿推崇倍至，名山事业，以为不朽。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虽属编辑之作，书健为是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其立意之新，挖掘之深，谓其创造性贡献，当之无愧。对来稿每反复润削；或重新选材，萃取精华，以求识遵意新；或理纷治乱，俾使主旨鲜明；数易其稿，渐臻佳境。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丛书之编纂何以成功，余以为此乃系之于建立了整理老中医经验的方法，此实为保证质量之关键。

书健认为，中医学术发展，必须注意不断提高中医队伍的科研写作素质，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论文科研水

平不高,老中医经验整理,每流于平淡,学术发展缓慢的问题。有鉴于此,他曾撰写专著《中医论文写作教程》(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出版)深入探讨中医写作之规律,兹又结合多年体会撰写了《老中医经验整理方法的探讨》一书。

书中全面论述了抢救、挖掘、整理、继承老中医经验在中医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临床价值、理论价值、文献价值;于文人治医对中医学术的影响,评价客观,切中肯綮;分析中医临床现状亦精僻透彻,振聋发聩;提出的老中医经验整理基本要求,切于实际;老中医经验整理中的关键是如何深入挖掘,把堪称独到,自成规律,自有见地的经验挖掘出来,于此,他提出了具体详尽的方法,诸如逐步逼近以聚焦,着眼细微,披砂炼金,发前人所未发。思路绵密细致,行文恣肆透彻,剴切陈明,条分缕析。非对中医写作研究有素,对老中医经验整理广积心得,曷克臻此。

既编纂巨制于前,又总结方法于后。斯著于老中医经验挖掘整理,诚为觉岸清钟,迷津宝筏,嘉惠医林,流泽于无穷,功不可没矣。余深信斯著之昭世,不惟对提高老中医经验整理水平颇多裨益,并将推动老中医经验之整理继承,推动中医学术之发展。喜读之余,聊识数语是为序。

傅景华

1993,5

目 录

第一章 发掘、抢救、继承老中医经验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关键 …	1
一、文人治医对中医学的影响	1
二、老中医经验是中医学术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三、中医临床和人才现状表明抢救老中医经验已成燃眉之急	17
第二章 整理老中医经验的基本要求	20
一、先进性、科学性	20
二、正确理解老中医经验整理中的创新	25
三、既要总结老中医自成规律的临床经验，又要挖掘其学术思想	27
第三章 直接资料的积累	37
第四章 如何挖掘老中医经验	41
一、逐步逼近以聚焦	41
二、深入挖掘必须着眼于细微之处	44
第五章 总结老中医经验常用文体及写作要点	63
一、医论	64
二、医案	79
三、医话	97
四、临床报道	101
五、临床研究	102
第六章 范文简析	113

第一章 发掘、抢救、继承老中医经验 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关键

一、文人治医对中医学的影响

研究中医学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医学与文史哲学的密不可分，她同文史哲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祖国医学一直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翻开中国文化史，不难看出，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道家、佛家都曾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人的医学著述，是构筑中医学殿堂的砖石梁栋。

先秦的孔孟及诸子大都通晓医理。《诗经》、《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典籍中多述及岐黄家言。西汉时期，通医文人渐多。如司马迁，在《史记》曾为扁鹊、仓公立传，仓公的二十五个诊籍，赖其整理而流传。王充著有《养性书》十六篇（《会稽典录》载），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曹丕有《魏文帝秘方》（《释僧深方》载），嵇康著有《养生论》（《博物志》载）。

中医界只知道皇甫谧是医学家，其实他是晋代著名的文学家，所著诗、赋、词、颂、论、难甚丰。著有《历代帝王世纪》、《逸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等书及文集。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历时十年写成《三都赋》，屡遭冷落，后来左思遵从张华之言，把《三都赋》送请皇甫谧请教，皇甫谧赞赏之余，欣然作序，此后《三都赋》人人传扬，“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足征皇甫谧在文坛之地位，显而易见，再著名的医家，也不会使《三都赋》洛阳纸贵的。皇甫谧，四十岁后因病立志研习医学。所著《甲乙经》至今仍为中医学必读之经典著作。《杨注难经》载皇甫谧尚著《脉诀》，《诸病源候论》尚载著有《论寒食散方》。

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曄，曾编撰我国第一部香类方药专著《和香方》，对后世药物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后汉书·历律志》等志、传中有不少关于医事制度，疾病流行、诊断、方药和治疗的记载，论述节气与疾病关系尤为细致。

褚澄有《杂药方》（《千金翼方》载）；萧衍有《坐右方》（《酉阳杂俎续集》载）；萧纲有《如意方》（《医心方》载）。

唐代出色的通医文人有：李白、杜甫、郑虔、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等。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不但有千古不

朽的《滕王阁序》而且还撰有《医语纂要》。被玄宗称为诗、文、画三绝的郑虔（杜甫挚友），曾著有《胡本草》，对西域药物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在本草史上有一定影响。

宋以前文人通医多为部分文人的兴趣，尚未形成独立的流派，产生足够的影响，大多数作品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理论层次尚低，儒家思想对医学的影响还不够突出。^{〔1〕}

宋代是中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中国科学技术在宋代成为高峰，印刷术的发明，造纸工艺的发展，为宋代文化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北宋统一后，相对稳定，户籍增长，生产力提高，在王安石变法推动下，太医局医学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并在社会上形成钻研医学的风气。

北宋之后由于文人从医与日俱增，逐渐形成了以整理研究文献为主的儒医派别。儒医，可以理解为，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因仕途失利而步入医坛，或因家亲病丧而矢志于医，或受名医影响，而献身岐黄，或弃儒从医，或儒而兼医，或知医而自用，或官职之余以医济人。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语出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仲淹久戍塞外，因不服水土，缺医少药，他操兵之余常研习医药，仕途不利后，更醉心于岐黄之术。

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著有《医问》一书。

〔1〕 李良松，郭洪涛编著，《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

史学家郑樵医学著述更丰，除《通志》中收载大量的医药内容外，尚著有《本草成书》、《食鉴》、《鹤顶方》、《草木外类》、《采治录》、《畏恶录》等。

沈括、苏轼有《苏沈良方》传世。

陆游晚年以医为乐，撰有《陆氏续集验方》（《宋史·艺文志》），其诗作中有不少记载了他的医药活动。

元代的元好问著有《集验方》（《中国医籍考》载）。

明代哲学家方以智著有《医学会通》，现安徽博物馆藏有抄本。序中云：“小子以智……塾中诵读之余，好穷物理，故记医为一编……就《灵》、《素》之条贯，详证治之准绳，约而记之，名曰《医学》，聊备遗忘，将来或有所引申而会通之，固携艺济人之一助也”。《内经经络》安徽省博物馆亦藏抄本。另有《医丹》、《脉参》、《医方大略》、《医集引》惜已佚失。

明文学家杨慎著有《素问纠略》。

傅山之《傅青主女科》为医家必读之书，然其在文坛上有如皇甫谧。是诗人、文学家、思想家，《霜红龕集》在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薛雪，清代医林之巨擘，所著《湿热病篇》、《医经原旨》皆为医家必读之书。然其文坛亦有盛名，《一瓢诗话》为文人所重。

《铁云藏龟》、《老游残记》的作者刘鹗尚著有《人寿安和集》、《要药分剂补正》、《温病条辨歌括》等医书。

蒲松龄尚著有《药崇书》、《伤寒药性赋》、《疾病》、

《草木传》等。

佛教虽经西域传入中原，但被我国的固有文化融合和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藏经》所收的 4200 余种佛教经籍中，专论医理或涉论医理的经书近 400 部。佛教教义对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教徒多习“五明”之学，其一即为“医方明”，医药学知识，即可凭医术养生疗疾，又可藉行医弘扬佛法，历代事佛而兼医的僧医代不乏人。

西晋于法开，著《议论备豫方》。

东晋僧医支法存著《申苏方》。

南北朝惠义著《寒食解杂论》；僧深著《僧深药方》；昙鸾著《调气治疗法》、《疗百病杂丸方》。

隋梅深师著《梅师方》、《梅师集验方》。

唐之高僧鉴真著《鉴上人秘方》，据报道鉴真医方已在日本被发现。

五代时高县乃萧山竹林寺女科始祖。

宋代庐山医僧法坚医术闻名于天下，太祖召见赐紫云袍，号“广济大师”。僧医文宥著《必效方》，诊病能“隔垣而知之”。

元代僧医继洪著《澹寮集验秘方》、《岭南卫生方》。

明清亦有一些知名的僧医。

宗教中与中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道教，古人有“医道同源”之说。道教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道功、外丹、药饵、道法、道术等都与医学有关。《道藏》中收书 1476

种,其中内、外丹专著 150 余种,涉及医学和养生达 900 种。百分之七十的道教著作与医药学牵连,或竟成为医书的组成部分。

凡修道之士,大都精通医理。

陶弘景著《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葛洪著《肘后备急方》、《金匮要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他们在道教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在葛洪之前,道教虽有一些经典和著作,但这些经典和著作还没有为道教建立一较系统的理论体系,道教之理论体系肇始自《抱朴子·内篇》,即葛洪为道教建立了理论体系。

陶弘景对早期道教的神仙学说做了总结和改造,为道教建立了一套神仙世界的谱系和道教传授的历史,建立了中国道教的主要宗派茅山宗。

文人治医对中医学的影响应当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进行研究,只注意一个方面,都是失之片面的。

(一) 文人治医对中医发展的积极影响

1. 文人治医提高了中医的素质

迨医巫分野后,中医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随着文人治医的不断增多,中医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大量儒医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医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扩大了医生队伍,促进了医学普及,有利于卫生保健,提高了全社会的医学水平。儒家伦理观,促进了古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中医历来强调医德,即渊源于此。

2. 文人治医，繁荣了中医学，引进了学术争鸣，促进了学术发展。

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阐义理，兼谈性命，故有理学之称。理学作为我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形态，大规模地渗透到医学领域，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经学从儒家观点对“太极”、“阴阳”、“象数”等概念进行阐述发挥，发展了太极宇宙模式，阴阳互根概念和象数原理，都成为医家用于研究医理的思想工具。如宋丹溪、张景岳、孙一奎都以太极之理为医学之本，张志聪以太极论胚胎，汪绂以太极论藏腑，高念祖以太极论药性，郑钦安以太极论病机，费启泰以太极论气血，赵献可以太极论命门，如是之“格物穷理”支配着医家致力于医学理论研究。^{〔1〕}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由于中医学派争鸣，促进了中医学术繁荣，推动了中医理论发展。

3. 医籍的校勘整理编撰刊行得到极大的发展

通医文人增加，对医学发展直接作用是形成了以整理编次医学文献为主的学派。如许叔微、王肯堂、张景岳、沈金鳌、徐大椿等，他们步入医林之前均为享誉文坛的文人。由于儒家济世利天下的人生观，促使了各阶层高度重视医籍的校勘整理、编撰刊行，以使之广为流传。自隋代开始，

〔1〕 李良松，郭洪涛编著：《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

历代朝廷大都组织过浩大的医书征集，汇编，整理校勘和出版发行工作。如宋代医书校正局，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对内经、伤寒的校勘整理。

（二）文人治医对中医学术的消极影响

1. 尊经崇古阻碍了中医学的创新发展

两汉后，在儒生墨客中逐渐形成以研究经学，弘扬经书和从经探讨古代圣贤思想规范的风气，后人称之为经学风气。如《汉书·艺文志》称“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历代儒士在著书立说时，无论其学说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得根据，并凭借对经典的注解而表达出来，方可为一般人接受。尊经崇古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

这种学风对医学之影响自宋代始已十分显著，严重地束缚了医学的发展，近人谢利恒曾提出：“儒家所谓道统者，移之而用于医者，于是神农、黄帝犹儒家之二帝三王，仲景、元化犹儒家之有周公、孔子矣。于是言医者，必高语黄农，侈谈灵素，舍是几不足与于知医之列矣。”^{〔1〕}一语道中了儒家尊经崇古之风给中医带来的影响。宋以来，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几乎均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注释与发挥为主要形式，于解释不通，已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所谓错简，脱衍等故，也不敢自立新说。

医经研读、类编、校正、考据、汇粹、发微、问难、解

〔1〕 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

感、钩玄构成了当时医学著作的主体。如徐灵胎所说：“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于古法”，经典著作乃“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尽管这些文献的整理对文献保留作出了贡献，但成为一种时尚，则将习医者带入尊经泥古的误区。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一直成为医学写作的指导思想，这种牢固的趋同心理，消磨、遏止了医家的进取和创新。

标志着明代本草学最高成就的《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科学巨著，对清代临床医学发展影响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医学出现了“定格”态势，并衍化成不议其病而先议药的弊端。如喻嘉言在《寓意草·先议病后议药》中指出：“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火枉不可胜掉……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从何应，致庸师以模棱迎合之术，妄为拟议。迨药之无效，诿于无药。”

尊经泥古带给医坛的是万马齐喑，见解深邃的医家亦不敢自标新见。即使是冲破尊经崇古思潮重压脱颖而出的温病学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犹抱瑟琶半遮面。如《温疫论》之作者吴又可在《温疫论》序言中云：“温疫之症，仲景原别有方，历年既久，兵火淹没，即《伤寒论》乃系散亡之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这完全是医圣必完，医经必全的崇古思想。吴鞠通把“桂枝汤”列为《温病条辨》第一方，与全书宗旨自相矛盾，以至成为反对者的众矢之的。

经学学风带给医家思想意识的影响，反映在中医上缺乏分析思想，以至解剖学、病理学方面缺乏微观认识，严重障碍了这些学科的发展。禁锢人们思想，导致了医学新思想的产生困难及产生后易受抑压，不能成长，也导致人们沿用陈旧的形式来容纳与之并不相称的新内容，从而限制了新内容的进一步发展，极大的延缓了中医学的发展。

2. 侈谈玄理，无谓争辨

我国现代科学的前辈，任鸿隽先生在《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指出：

“秦汉以后，人心桎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行避实际。”“高谈性理，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日；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牛马不相及。”一些医学家受理学方法影响，以思辨为主要方法，过分强调理性作用，心外无物，盲目夸大了尽心明性在医学研究中的地位，阻碍了中医结构分析思想的发展，对医学事实进行随意的演绎推理，以至于在各家学说中，掺杂了大量的主观臆测，似是而非的内容。无谓争辨中的医家，所运用的思辨玄学的方法，使某些医学概念外延无限拓宽，反而使内涵减少和贫乏，事实上思辨只是把人引入凝固的空洞理论之中。这种理论似乎能解释一切，又一切都解释不清。它以自然哲学的普遍性和涵容性左右逢源，一切临床经验都可以成为它的诠注和衍化，阻碍和束缚了人们对问题继续深入的研究。理论僵化，学术惰于创新，通过思辨玄学方

法构建的一些理论，不但没有激起后来医家的创新心理，反而把人们拉离临床实践的土壤。

如薛立斋、赵献可的“肾命说”，孙一奎的“三焦说”，张景岳对朱丹溪的无谓争辨。实际上，三焦、命门之争，玄而又玄，六味、八味何以包治百病？

3. 无病呻吟，附庸风雅的因袭之作

“立言”的观念在文人中根深蒂固，一些稍涉医籍的文人，优哉闲哉之余，也附庸风雅，编撰方书，有的是零星经验，有的只是道听途说，或率意为之，东拼而凑的因袭之作。有一些医家也曾提出批评。

4. 重文献，轻实践

儒医思想方法对中医影响之巨烈者，为重文献，轻实践。

尝见某君著文，儒家重实用的作风使中医偏重于临床经验的积累而限制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余以为不然。儒家思想使儒医侧重于医理的研究整理，而忽略了临床经验的积累。

受到经学的影响，中医的研究方法大抵停留在医书的重重复订、编次、整理、汇纂，呈现出“滚雪球”的势态。从传统意义上看，尚有可取之处，但在时间上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因为这样的思路延缓了中医学的发展。

翻开中医文献，虽然也可以分成很多类，但，约其要者可以分成这样几类：

医经系统，历代数百注家，或节录或串讲，洋洋大观。

伤寒系统，有人统计注释伤寒不下千余家，主要是编次、注释，但大都停留在理论上的发挥和争鸣，甚或停留在如何恢复仲景全书原貌等问题上大作文章，进而争论诋毁不休，站在临床角度上深入研究的大少了。

方药系统，或简编，或扩编，历代本草方书洋洋大观。

各科杂病系统，中医这个系统显得不成体系。因为在这个系统中，绝大多数医著实际上是方书。如《刘涓子鬼遗方》、《妇人大全良方》是外、妇科著作，还是方书，当然列入方书更为恰当。有少数不能列入方书系统的，也是多方少论。

整个中医研究体系中重经典文献，轻临床实践是十分鲜明的。

一些医家先儒而后医，或弃仕途而就医者，他们系统研究中医时多已年逾不惑，还要从事著述，真正从事临床的机会，时间并不多，即使写出有影响的医著，其实践价值仍需推敲。

苏东坡曾著《圣散子方》一书，某年大疫，苏轼用圣散子方而获效，逾时潮洲又逢大疫，又告知民众用圣散子方，而貽误病情者甚伙。

朱丹溪著《局方发挥》，是看到了俗医不讲求辨证论治，滥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流弊太多，对此不得不痛下针砭。

文人治医，其写作素养，在其学问成就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是其在临床上有多少真知灼见。在中医发